



踞 拆 津 之 阳

阎玉田 著

天津工商大学

天津工商大学踞拆津之阳，是现河北大学的前身。该校是法国天主教会于1921年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自创立开始，即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与模式，开设现代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学科，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驱和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教育出版社

本书列入 河北大学历史学 丛书
中国教会大学

踞拆津之阳

阎玉田 著

天津工商大学

天津工商大学踞拆津之阳，是现河北大学的前身。该校是法国天主教会于1921年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自创立开始，即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与模式，开设现代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学科，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驱和重要组成部分。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踞柞津之阳——天津工商大学/阎玉田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ISBN 978-7-01-009345-1

I. ①踞… II. ①阎… III. ①天津工商大学-校史 IV. ①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169 号

踞柞津之阳——天津工商大学

JU TUOJIN ZHI YANG TIANJIN GONGSHANG DAXUE

阎玉田 著

策划编辑:李 斌

责任编辑:余 娟

出版发行:人 民 出 版 社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100706

邮购电话:(010) 65250042 65258589

印 刷:三河市顺兴印装厂

经 销:新华书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14

字 数:237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09345-1

定 价:30.00 元

总 序

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文化交流的产物。教会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重要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断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作用。

至 1949 年，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是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 10%—15%，但教会大学优质的教学质量足以弥补其数量上的不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教学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中国教会大学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较有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贡献较大。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随着本土化进程的加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教育功能日益增长，而且不断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并为社会服务。它们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

圣约翰的商科，等等，都为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 with 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取中国文化，并将其带回西方。所以，对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探讨中西文化的双向流动，可能会成为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课题。

毋庸讳言，一些教会组织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自 20 世纪 20 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它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区分开来。这种偏颇的评价，对于那些勤恳的毕生奉献教育事业的中外教职员，很难说是公正的评判。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全面、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教会大学在中国内地突然消失了。正如曾经在金陵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Fenn）所言：

在 20 世纪上半叶画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地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

建筑和设备依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失。结局是悲剧性的，但过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两岸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

2003 年 10 月是我曾为之工作半个世纪以上的华中师范大学的百年校庆，谨以中国教会大学丛书，献给所有曾在中国教会大学校园内勤劳耕耘过的中外前驱者。

章开沅

2003 年春于桂子山麓

前 言

所谓教会大学，是指从 19 世纪末开始，西方基督教差会和天主教修会在中国陆续开办的高等教育机构，共计 16 所。（见下表）其中由基督教（新教）差会创办的大学

附表 16 所中国教会大学列表

所在城市	学校名称	主办教会组织	校 址
上 海	沪江大学—University of Shanghai	美南浸信会、美北浸礼会	杨树浦军工路
上 海	圣约翰大学—St. John's	美国圣公会	沪西极司非尔路
上 海	震旦大学—Université Aurore	法国耶稣会（天主教）	法租界吕班路
北 京	燕京大学—Yenching University	卫理公会、美国公理会等	海淀
北 京	辅仁大学—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美国本笃会（天主教）	定阜大街
天 津	天津工商大学—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et Commerciales	法国耶稣会（天主教）	英租界马场道
苏 州	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	美国卫理公会	苏州天赐庄
南 京	金陵大学—University of Nanking	美国卫理公会、长老会、基督会等	鼓楼
南 京	金陵女子大学—Ginling College	美国卫理公会等	宁海路
杭 州	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	美南长老会、美北长老会	月轮山麓二龙头山麓
广 州	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	美北长老会	河南康乐村
长 沙	湘雅医学院—Hsiang-ya Medical College	美国雅礼会	麻园岭
武 昌	华中大学—Central China University	美国圣公会、雅礼会、复初会，英国循会、伦敦会	昙华林

续表

所在城市	学校名称	主办教会组织	校 址
济 南	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	美北长老会、英国浸礼会等	南关
福 州	福建协和大学—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美国美以美会、公理会、归正会、英国圣公会	鼓山麓闽江畔魁岐村
福 州	华南女子大学—Hwa Nan College	美国卫理公会	仓前山
成 都	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五教会	华西坝

计有 13 所。^① 由天主教会（旧教）修会创设的计有 3 所。^② 天津工商大学是由罗马天主教廷资助，并受其教育部指导，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Societas Jesus）于 1921 年在天津创办的。

一、教会大学史研究现状、意义、观点与方法

教会大学产生于中国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制度社会转型的清末民初，发展于动荡不安的民国时期。其在中国存在时期，正是中国近代化起步与发展的关键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发展过程中参与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建设、民族主义运动，等等，因而，它“不仅对于近代教育发展的研究极具学术价值，而且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史、宗教史、政治史、社会史的研究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③。“对于在中国存在半个世纪以上的这一特殊教育群体，必须认真加以研究，包括其正面的与负面的社会效应及历史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对中国近代教育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获致全面的理解。”^④ 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成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驱和重要组成部分，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占据重要地位。

① 基督教（新教）差会创办的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

② 由天主教会修会（旧教、也称耶稣会）创设的 3 所大学：上海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大学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开办；北京辅仁大学由美国天主教本笃会开办。

③ 马敏：《近年来大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综述》，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6 页。

④ 章开沅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珠海出版社 1999 年版，序。

西方大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教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确立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配合相关帝国主义国家压迫奴役中国人民，这遭到了包括官绅阶层和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民的强烈抵制。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掀起“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教会学校受到一定冲击。与此同时，在中国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下，为数众多的中国基督教徒以及部分领袖人物开始明确强调并推动基督教本土化。教会大学的功能随之发生变化，即转变为以社会、自然科学教育为主，培养高级布道师或宗教领袖、发展教徒为辅。事实上，这些教会大学除了传播“上帝福音”，配合西方帝国主义压迫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与功能外，在客观上引进西方先进教育理念与模式，开设自然科学和现代社会学科，对于促进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培养具有现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人才、适应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此外，教会大学科学的教学组织管理，在这些学校任教的中外教师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传教士教师不计任何报酬、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对于人才的培养和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促进作用，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中国大陆学者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一直将教会大学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反动思想的堡垒”，很少有人着手研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人们才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的研究，但研究模式基本是以“文化侵略模式”为指导，缺乏客观深入的分析 and 评判。80 年代中期，恰逢中国处于经济上对外开放、思想上解放的时期，徐以骅在《基督教在华高等教育初探》中提出重新研究和评价教会大学史的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1989 年 6 月，首届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大召开。来自国内外的四十余名学者聚集一堂，对中国教会大学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围绕“中国教会大学史”这一课题，先后在华中师大、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美国耶鲁大学、台湾中原大学等地召开了九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史学界、科技界和哲学界的学者对于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大学的主要目的存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有些科技界学者认为，近代科技本来就产生于基督教文化背景，牛顿、伽利略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基督教徒，他们并不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因此近代来华传教士及其所创办的教会大学对科技的传播并非只是一种传播基督教的手段。有的哲学界

学者则从基督教哲学的角度认为,基督信仰在现代科学的奇迹中所具有的奠基性意义是举世瞩目的,完整的基督真理必然包含对基督的信仰,因此传教士来华传教,注重对于科技的传播正是基督教完整性的表现。历史学者习惯于站在历史角度认识与观察问题,认为西方国家基督教和天主教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传播天主教、基督教教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确立西方文化的强势地位。他们在中国开办大学,是为了提高在中国传播“上帝福音”、发展基督教信徒、使之基督化的功效需要——培养高级布道师或宗教领袖,把目标转向家境殷实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来华开办大学只不过是传教的方式和手段,因此我们不能过高地估计传教士来华传播科技的历史地位,不可忽略其以传教为主的特性。在这些研讨会之后,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逐渐形成一股“热潮”。

为了将教会大学史研究在中国大陆进一步引向深入,自1991年始,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章开沅先生主编的《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论文辑,计有六辑。1994年,又以章开沅先生为首,在华中师范大学创办了“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从而为相关学者对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并且引起国际华人相关学者和组织的极大关注,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合作的特点。在“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的组织与指导下,得到美国旧金山华人学者组织的美国鲁斯基金会、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等基金会的资助,1999年至2003年期间,珠海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批相关专著、译著和教会大学校史丛书。

截至目前,基督教会、天主教会在近代创办的16所教会大学史,在美国鲁斯基金会、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等基金会的资助下,已由珠海出版社出版了《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计有译著14本。^①于2003年9月以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

① 章开沅、马敏主编:《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第1辑,8册,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美〕柯约翰著,马敏、叶桦译:《华中大学》;〔美〕郭查理著,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美〕队克勋著,刘家峰译:《之江大学》;〔美〕黄思礼著,秦和平、何启浩译:《华西协和大学》;〔美〕罗德里克·斯科特著,陈建明、姜源译:《福建协和大学》;〔美〕文乃史著,王国平、杨木武译:《东吴大学》;〔美〕德本康夫人、蔡路得著,杨天宏译:《金陵女子大学》;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第2辑,6册,珠海出版社2005年版;〔美〕吴小新著,张晓明译:《北京辅仁大学——天主教笃会暑期的个案研究》;〔美〕芳威廉著,刘家峰译:《基督教高等教育在变革中的中国》(1880—1950);〔美〕海波士著,王立诚译:《沪江大学》;〔美〕艾德敷著,刘天路译:《燕京大学》;〔美〕华惠德著,朱峰、王爱菊译:《华南女子大学》;〔美〕贾玛丽著,王东波译:《圣约翰大学》。

版的《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计有7本，^①唯有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中国开办的两所教会大学——上海震旦大学与天津工商大学史未得面世。因此，编著天津工商大学史具有补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空白的意义。

作者试图遵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治史原则，重点深入分析、总结天津工商大学在教学组织管理、学科建设、发挥大学育人功能、联系社会实践、发展成人教育等方面的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正如章开沅先生在《教会大学在中国》“总序”中所说：“毋庸讳言，一些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自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它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题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政策区分开来。这种偏颇的评价，对于那些勤恳的毕生奉献教育事业的中外教职员，很难会说是公正的评判。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的、全面的、科学的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②

二、天津工商大学史未面世原因

天津工商大学史之所以迟迟未能面世，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由于16所中国教会大学中的14所是由美国基督教、天主教差会开办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相关学者取得了对此14所教会大学的研究成果。自1999—2005年，由章开沅、马敏主编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丛书》，分两辑先后将此14本译著在珠海出版社出版。在中国大陆学者对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形成的这股“热潮”中，

① 章开沅主编：《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7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江汉县华林——华中大学》；《博习天赐庄——东吴大学》；《海上梵王渡——圣约翰大学》；《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相思华西坝——华西协成大学》；《金陵百屋房——金陵女子大学》；《香飘魏歧村——福建协和大学》。

② 章开沅主编：《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序。

表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主要侧重于对基督教（新教）开办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而对天主教（旧教）开办的大学的研究相对较弱。上海震旦大学与天津工商大学因由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开办而少有人问津，这是天津工商大学史迟迟未能面世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天津工商大学历史文献档案资料珍藏分散、缺乏完整性是最重要的原因。如国家图书馆、科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天津自然博物馆、天津档案馆、河北大学档案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及档案馆、天津大学档案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等，虽均有珍藏，但全都显得零碎、重复、种类偏少。这使得相关学者感到对天津工商大学史的研究较之基督教会开办的院校难度大。

第三，1994年，以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为首创办了“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为什么未能与河北大学建立相应联系？笔者认为可能与如下因素有关：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系调整时，津沽大学的三个学院一分为三，河北大学于1970年从天津市搬迁至河北省保定市，致使“中国教会大学研究中心”忽略了河北大学与天津工商大学的关系。比如2004年由周洪宇、张云芳编写，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教会教育史研究文献要目（1961—2003）》，在天津工商大学《档案资料珍藏与分布》中指出：“天津市储藏原天津工商大学历史文献资料最集中、最丰富的地方之一”，并且列举“文献收藏处是天津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及档案馆、天津大学档案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天津档案馆、天津自然博物馆等处”，其他如“北京图书馆，北京科学图书馆等处，上海图书馆也有收藏部分有关文献资料，河北大学收藏情况不详”。^①

第四，事实上，在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对教会大学进行撤并改造时，原津沽大学（其前身为天津工商大学）的主要文献档案资料留存于新组建的天津师范学院（即今天的河北大学）档案馆。这对河北大学相关学者研究天津工商大学史无疑属近水楼台，但他们为什么“无动于衷”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对此重视、关心和支持力度不够，致使该校相关文献资料缺乏编辑整理，杂乱无序地存放于档案馆，不便利用，造成相关教师总是感觉不具备相应的科研条件。直至2000年，为迎接河北大学建校80周年

^① 周洪宇、张云芳编：《中国教会教育史研究文献要目（1961—2003）》，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校庆（2001年），出于编写《河北大学史》的特殊需要，这些资料为“救急”所用。参加编写者和档案馆工作人员付出了巨大艰辛，同心协力，对相关文献档案进行了初步梳理。此后，档案馆工作人员又耗费了相当时间与精力，进行了较为系统、规范的编辑整理工作。

第五，导致天津工商大学史的编著出版拖延至今，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学者长期以来受“左”的思想影响，将教会大学研究视为“政治敏感问题”，谁都不愿踏越雷池自寻徒劳无益，而采取回避态度。

2011年，河北大学将迎来建校90周年华诞，学校相关部门和领导对此书的编辑出版予以高度重视；河北大学档案馆、图书馆、相关同行同事全都给予了大力协助、支持和鼓励，才使得天津工商大学史有机会问世。

三、历史沿革与基本思路

（一）历史沿革

天津工商大学，1921年创办，1933年10月更名为“私立天津工商学院”。此后，为了恢复“大学”的名分，全校教职员齐心协力，在极其恶劣条件下，抓住机遇，办学规模得到迅速发展。至1948年，学校达到三院十系规模。^①天津工商学院更名为“私立津沽大学”。1951年9月，私立津沽大学改为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国办大学。

1952年7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彻底收回教育主权，对全国大专院校、系和专业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实际上对教会大学进行了撤并改造：将津沽大学原有的工学院与原北洋大学合并，组建天津大学；财经学院调整到南开大学；以仅剩的文学院为基础，与原来天津教师学院合并，在津沽大学原址组建天津师范学院。原来与天津工商大学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北疆博物院，于1951年9月被天津市文化局接管，1957年更名为天津自然博物馆。至此，原来意义上法国天主教会（耶稣会）开办的津沽大学，与全国其他15所教会大学一样，在中国不复存在。

^① 国民政府教育部规定须达三院九系始可称谓“大学”。

随着办学规模的不断发展，天津师范学院于1958年更名为天津师范大学，1960年更名为河北大学。因天津市1967年划归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1970年，河北大学迁至当时河北省省会保定市至今。河北大学在天津的原校址，除仅剩一留守处外，现为天津外国语学院所用。

（二）基本思路

天津工商大学从1921年开办，至1951年转变为隶属教育部的高等院校，教会时期共计有整整30年。根据上述学校办学规模的发展和学校名称的变化，将教会大学时期30年历史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创办探索时期——天津工商大学时期（1921年—1933年）；

迅速发展时期——天津工商学院时期（1933年—1948年）；

鼎盛时期——津沽大学时期（1948年—1951年）。

本书具体分六章叙述，最后是大事记。

四、几点说明

第一，本书除了引用相关重要参考文献，最主要依赖河北大学档案馆珍藏的相关原始文献档案资料。所有相关引文，均经河北大学档案馆开发编研部副研究馆员王珊负责，按规范档案编号一一认真校对，以保准确无误。本书选用的所有相关档案图片，均由河北大学新闻中心王二军先生精心扫描处理，尽量使之清晰。读者可对本书所有引证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和采用的档案图片，按河北大学档案馆编排的序号查对。

第二，本书大量引用的一些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文献，如天津工商学院出版委员会1935年出版的《私立天津工商学院一览》，1950年8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编印的《高等学校教学草案》，以及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对津沽大学下达的一系列指令、函件（大多是打印件甚至是手刻的油印件），1964年赵振生译自拉丁文原著《天津工商学院简史》（手抄本），等等，河北大学档案馆均有珍藏。此外，解成1994年编著的《河北省天主教历史编年》（铅印本），珍藏于河北省民族宗教厅；1990年献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的《献县天主教志》（打印稿），珍藏于献县民族宗教局；《沧州宗教志》（打印本），珍藏于沧州市民族宗教局。限于种种原因和当时的条

件，上述文献虽然不是“正式出版物”，但确实属于本书论证所需要的可靠、珍贵、不可多得的原始档案文献资料。

第三，学校属于教育机构，不同于单纯的科研单位，其最主要的功能和任务是为社会建设培养人才。因此本书自始至终以论述教学及组织管理、师资队伍、科研、图书与试验设备、学科建设、学生生活为主体内容。但对与之密不可分的其他事项，采取详略有别的处理方式。如对北疆博物院进行较为详细叙述，而对诸如经费、附中等则予以简明扼要地介绍。

第四，为了尽量保持全书的系统完整，避免结构上的支离破碎，对学校发展具有较大影响、且贯穿于教会大学时期 30 年始终的某些重要因素，诸如北疆博物院、图书资料、教学试验设备、学生生活、附中等，本书采取在某一章节集中全面叙述，而不按历史阶段分三部分分别叙述。

第五，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对在教学活动、教学组织管理、学术研究等方面对该校的发展作出显著贡献且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中外知名教授、学者和学校相关领导，本书按照发展顺序，结合历史内容分别予以简要介绍，而不采取专设“重点人物略传”于书后的惯例。

第六，本书封面于《天津工商大学》书名前，冠以“踞桥津之阳”，是取自该校 1937 年的校歌歌词“煌煌我校，踞桥津之阳”。其中“踞”者，意为“险要”，如“龙盘虎踞”。“桥”（音 tuò）者，乃为古时巡夜之人打更用的梆子，现代汉语一般与“拓”字通用，引申为“开拓”之意。“煌煌我校，踞桥津之阳”，大意为：赫赫有名的天津工商学院，凭借雄踞中国北方水陆交通枢纽——天津之优越条件，不断开拓进取，前途灿烂辉煌。

五、一点体会与感怀

最后，是自己几十年来从事历史学习、教学、科研与编著此书的一点体会：无论做任何事情，都必须遵循从客观实际出发，严格按事物发展规律的行为准则。否则徒劳无益，必然遭受挫折与失败。无论何人何事，概莫能外。

办教育也是如此，常言道，“百年树人”，即是说人才的培养需要相当的过程，不可急功近利，重蹈“教育大跃进”的覆辙，必须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所谓“有状元徒

弟，无状元师傅”的俗语，说明了教学的主要功能和任务。评判师傅培养徒弟成绩的大小，不仅要看师傅的技术、知识和能力是否过硬，关键还要看他带出的徒弟是否具有创新能力，超越了自己。同样，评判大学办学成功与否和水平高低，决不可仅凭其办学规模大小，更不能以目前高校盛行的盲目追求发表、出版“论文”、“专著”统计出来的“GPD”数字作为标准。最重要是看其培养的毕业生对社会，对国家政治、经济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与社会影响的大小。

在人的一生中，大学四年可谓最重要的阶段，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大学时代不会重来。大学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优秀人才的历史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等教育不仅关系到大学生一生的命运和前途，而且关系到国家民族的未来。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先生在《教会大学在中国》丛书“序”中所说：“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孕育形成。”因此，无论在任何形势下，学校都必须坚持以为社会建设与发展培养人才为根本出发点，以培养学生具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与创新能力为目标，坚定不移地以教学为中心，以教学带动科研，以科研促进教学，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促进学科建设发展的办学方针。肩负传道解惑、教书育人责任的教师，首先应该做到为人师表，寓教于举止言行之中，潜移默化地给学生以良好影响。

近十年来，中国的教育事业得到突飞猛进、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2010年，中国957万名学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生。中国大学由培养社会精英转变为大众普遍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培养了大批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全民文化素质，但也暴露出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一，在中国教育大发展形势推动下，部分高等院校校长、院长雄心勃勃，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或“争创国内一流大学”，争相扩大学校规模。专科学校合并升格为学院，学院合并升格为大学，专业性大学合并升格为综合性大学，理工大学添设人文学院。更有干脆是原班人马、原有教学设施，只需换一张校牌，中等专业学校即“升”为大专，甚至称作某某学院；学院“升”为大学，令人啼笑皆非。各省市竞相建设“大学城”，各大学争相建“新校区”，动辄占地一两千亩甚至几千亩，相互攀比，不惜巨资盖豪华大楼。一个大学建筑贷款高达几亿、十几亿。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统

计，到2009年，全国大学负债达两千多个亿。“曾有媒体报道的数字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①。

针对有的学者提出“办大学最需要的是大师，而不是大楼”的言论，有的校长公然在学校教职工大会上振振有词地予以反驳：“没有梧桐树，怎能招致凤凰来？没有大楼，哪来的大师？”更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此奇谈怪论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第二，政府相关部门对学校的评估体系存在一定弊端。比如近年来对全国大学本科教学进行评估，目的在于促进各个大学重视教学及保障教学质量。评估对于促进本科教学组织管理规范化产生了一定的积极的效果。但评估的程序、措施、标准依据诸方面科学性、合理性有限，不仅对于提高教学质量效果有限，反而在广大师生中造成较大负面影响。

第三，学校对教师的职称职务以及各种荣誉称号、教学优秀奖励等的评定的程序与标准，都存在的问题。由于教学不会立刻产生“效益”，而可以“量化”打分的“科研成果”便成为唯一的硬指标，这导致教师们被迫“双肩挑”。他们为了职称晋升和争得不菲含金量的种种“荣誉称号”，不再把主要精力用在教学而用于“科研”上。然而一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总是有限的，每个人都做到教学、科研“两个肩”都过硬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大学里“剽窃、抄袭”丑闻屡见不鲜。

第四，近期有的高校偏离了“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正确轨道，在办学理念上出现“商品化”、“产业化”倾向。表面看这是为了扩大办学规模，发展教育，其实最终目的是为了无限制地扩大招生名额，尽量多收取学费。

第五，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即使大学教授教学再好，对学校的“效益”与发展远不如校领导们成绩显赫。既然学校各级领导们对学校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给予其不菲的津贴待遇以及各种实惠的荣誉称号也就理所当然了。此外，他们还可利用行政职务的人际关系轻而易举地承担省部级、国家级科研立项，争取到科研资助基金，于是，在某些高校中出现众多教授、学者、博士们为得某一“处长”甚至一“科长”岗位职务竞折腰的奇特怪相。这种恶性循环造成这些大学“官本位”倾向愈演愈烈，行政管理体制越来越官僚化。

^① 《燕赵都市报》2010年6月15日第6版。